

城市本地家庭和农村流动家庭的消费差异 及其影响因素*

——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的分析

曲 玥 都 阳 贾 朋

摘要：消费水平不仅仅是度量人民生活的主要方面，更是今后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理解消费行为及其变化，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2016年和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CULS4和CULS3），估算并刻画了城市本地家庭和外来流动家庭的消费模式，并分析两个群体消费模式差异的决定因素，进而分析了与户籍相关的养老保险状况对于家庭消费决定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外来流动家庭的养老保险水平远低于城市本地家庭，而家庭预期从养老保险中获得的收益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当前的消费水平，尤其是对于较低收入群体。因此，进一步消除与户籍制度挂钩的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有助于实现流动人口和城市人口消费模式的趋同，拉动总体消费水平、扩大消费的潜力。

关键词：消费模式 社会保险 外来流动家庭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一、导言

（一）研究背景

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关键时期，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导的改革措施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新动力的关键。与此同时，优化需求结构，发挥消费在需求侧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非常必要。消费的水平 and 构成是度量福利的最重要的指标，因此，理解消费行为及其变化，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为出口、投资和消费。然而，以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显现了其弊端，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等问题已经

*笔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研究”（批准号：71642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刘易斯转折期间的劳资关系治理”（批准号：7147326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劳动力市场转折对中国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的挑战及政策应对”（批准号：71173234）的资助。

开始显现（谭语嫣等，2017）；随着劳动力成本态势的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也开始式微；另外，随着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的不稳定因素都会使得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变得脆弱。这些形势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愈发迫切地需要依托国内经济体系的稳健支撑（都阳，2018；吕悦等，2019）。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水平不仅仅是度量人民生活的主要方面，更是今后拉动经济增长的未来方向。因此，关注家户的消费函数和消费态势，了解不同群体的消费模式，并找到可能抑制消费的制度性问题，成为重要的议题。

（二）有关消费形成的理论和经验探讨

有关消费函数形成的理论机理，朱信凯等（2010）对相关文献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消费函数理论起源于凯恩斯（Keynes）的《通论》，虽经相对收入假说、生命收入假说等理论的不断发展完善，但始终强调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而对于其中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的讨论从未停止（杨汝岱等，2007）。在实证方面，有大量研究探讨了消费决定的影响因素，其中不乏讨论移民或户籍制度对于消费倾向的影响。陈斌开等（2010）基于 CHIPS 数据的分析发现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进一步地，有部分研究特别关注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健康和医疗保险对于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何兴强等（2014）探讨了医疗保险的消费促进效应；白重恩等（2012）从预防性储蓄的角度上关注了医疗保险对于消费的影响；臧文斌等（2012）也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于家庭分项消费的影响。相比之下，探讨社会保障制度中养老保障对于消费的影响的文献略少。Attanasio and Brugiavini（2003）、Attanasio and Rohwedder（2003）讨论了英国和意大利养老保险对于储蓄（消费的反向指标）的影响；周绍杰等（2009）关注了养老金收入对于储蓄的影响；而关于中国养老制度和养老金对于消费可能产生的影响，徐舒等（2013）的研究发现养老金替代水平的提高可以带来消费的增长。

应该说学界始终在讨论消费形成的理论基础、形成机制并进行着对于拉动消费的途径的相关探讨，而且也分别从户籍和保障制度两个方面都做出了一些相关实证分析。然而，将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与之挂钩的养老保障制度这两个相联系的方面综合起来考察其对于家户消费的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本文在测算本地和外来家庭消费倾向差异的基础上，从预防性储蓄的角度重点考察户籍的不同如何通过可获得养老保障水平的差异对于家庭消费产生影响。这对于如何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设一体化保障体制以便进一步拉动消费潜力具有一定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三）人口流动模式、社会保护与消费模式

在不考虑流入人口个体特征的情况下，原本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流动到城市以后，将使城市常住人口的构成发生变化。由于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消费水平和模式上存在差异，如果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消费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那么，人口流动而产生的城市常住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导致不同人群之间消费倾向的差异。更进一步地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流入人口没有融入城市，这种消费差异性就有可能固化。在劳动力流动的初期，消费模式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蔡昉，2011）。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以在城市务工经商获取收入作为主要目的，决定了他们并没有把城市作为其消

费的主要场所。在劳动力流动的初期，农民工主要以汇款的方式向留守农村的家庭成员进行收入转移，并成为外出劳动力和家庭之间重要的经济纽带（都阳、朴之水，2003）。流动人口向其他家庭成员转移收入的增加，必然会减少其在流入地的消费，并对其消费结构产生影响。一些制度性因素成为不同群体间消费倾向差异持续存在的根源。由于社会保障与户籍挂钩，导致了流动人口很难获得与城市本地人口相同的社会保护，这必然使有在流入地长期生活意愿的流动人口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减少即期的消费水平，并使消费结构更倾向于基础消费。

人口流动的模式由劳动力流动所主导，这导致了城乡之间的人口结构在急剧的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了更明显的结构扭曲。由于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彻底，人口流动主要由劳动力市场信号所引导，即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工资差异，引导了人口流动的方向和规模。这种流动模式具有高度选择性，即只有那些个人禀赋符合劳动力市场需要的劳动力才能流动。老人和少儿等抚养人口，则由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不足，成为留守群体。人口结构迅速转变已经造成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在总体上发生了变化，并导致老龄化程度逐步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而以劳动力流动为主的高度选择性的人口流动模式，则更加剧了人口结构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图1使用了2005年和2015年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刻画了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在10年间的变化情况。从该图可以发现，由于高度选择性的劳动力流动，城市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10年后有了较明显的增加，而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则有明显减少，由于不同人群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上的差异（Du and Wang, 2011），即便城乡人口的消费模式没有差异，这种选择性的人口流动模式由于改变了城市的人口年龄分布，也会带来总体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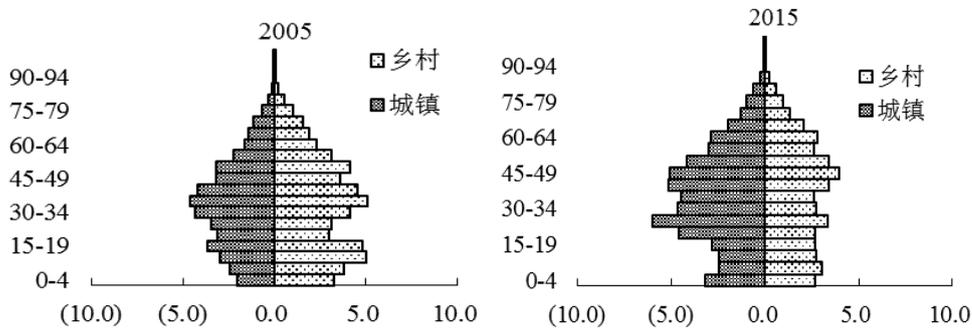


图1 2005年至2015年城镇和乡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因此，带来城市本地家庭和外来流动家庭消费差异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与人口的年龄构成相关的消费特征差异，无论是从总量还是结构上，消费的年龄性差异始终存在（李文星等，2008；王金营等，2006）；另一方面由于预防性的储蓄的需求会挤占当期的消费需求（臧旭恒等，2000；凌晨等，2012），社会保险作为预防性储蓄的方面也会造成消费差异。正因为如此，本文以下的经验分析将利用住户调查资料，关注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本地居民之间消费模式是否存在差异，并依据笔者所能掌握的信息，在年龄结构和社会保险所带来的预期保障两个方向上尝试理解造成这种消

费模式差异存在的原因。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

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后简称 CULS）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组织实施的针对城市住户的劳动力调查。2001 年至 2016 年，该调查一共进行了四轮^①。2016 年的第四轮调查在上海、广州、福州、武汉、沈阳、西安 6 个城市实施。调查以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抽样。在每个城市，以主城区的常住人口为总体，采用两阶段抽样方法抽选样本：第一阶段抽取居委会，采用与常住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PPS）方法来抽选出预定数量的居委会^②；第二阶段抽取住宅，在每一个抽中的居委会内，先抽取一定数量的建筑物，再针对抽中建筑物的所有住宅进行摸底，然后根据摸底信息分别建立本地户和外来户的住宅抽样框资料，最后采用随机等距方法抽选出一定数量的本地户和外来户。

调查在实施过程中使用了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Computer 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 CAPI），由调查员持平板电脑进行入户访谈，调查完成后数据实时传输到调查总部审核，数据采集质量和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调查最终收集到的有效样本共涉及 260 个社区，包括 6478 个家庭的 15448 人，其中城市本地家庭 3897 个、9753 人，外来家庭 2581 个、5695 人。样本对城市具有代表性。CULS 问卷包含了丰富的信息，涉及个人及家庭的基本特征、教育、就业、收入、消费、技能、时间配置、社会保护以及主观态度等。

（二）主要指标和模型设定

对于本文的分析来说，有 3 个重要的数据指标，分别是收入、消费和养老保险指数。其中，收入的度量相对较为直接，本文对收入的定义为家庭成员的工作收入、家庭财产和转移收入以及已获得的养老金收入 3 项的总和^③。另外，消费和养老保险指数两个指标的测度则需要一定的处理过程。

1. 消费变量的设定。本文对消费的定义为家庭日常支出、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和经济支出以及家庭医疗支出 3 项之和。虽然对于教育支出归属于消费性质还是投资形式存在争议，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居民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居住、其他 8 大项。此外，本文所关注的消费定义更加侧重于支出方面的含义，而不再甄别其是否具有投资属性。

^①关于 CULS 的更多介绍，请访问 <http://www.culs.org.cn>。

^②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一个特点是对于外来人口进行了过度抽样。由于沈阳和西安的外来人口较少，因此对于这两个城市，采用分层 PPS 抽样方法来抽取居委会样本，即按照居委会的外来人口数对每个城市主城区内的所有居委会进行分层，在每一层内采用与常住人口规模成比例的 PPS 抽样方法来抽选出预定数量的居委会。上海、广州两个城市抽取的居委会数量为 50 个，其他城市为 40 个。

^③已获得的养老金收入（即拥有养老保险并已经获得了养老金收入）用以区分本文后面用以度量养老保障水平的预期养老金收入水平（即拥有养老保险预期会获得但尚未获得养老金收入）。

其中，对子女的教育和经济支出的具体指标参照两项指标进行设计：

(1) 教育支出（对象：所有在上学的人）：

$$edu_expense = CA3 + CA4 + CA5 \quad (1)$$

其中，CA3 指过去 12 个月家庭交给学校的学费、杂费、课本费共多少元；CA4 指过去 12 个月家庭为子女上兴趣辅导班、文具、辅导材料、课外书等花费的费用共多少元；CA5 指过去 12 个月家庭为子女支付的食宿费用和交通费用共多少元；

(2) 对不住在本户但上学子女的净经济支持：

$$support_child = AD9 - AD10 \quad (2)$$

其中，AD9 指过去 12 个月家庭给子女提供了多少元经济支持；AD10 指过去 12 个月子女给家庭提供了多少经济支持。

最终用于消费定义中的“对于子女的净经济支持”采用对该子女的教育支出 $edu_expense$ 和对不住在本户的该子女的净经济支持 $support_child$ 中数额更高的（即只取其中一项最高的）。此外，考虑到与住房相关的支出性质较为复杂且涉及金额较大^①，本文尝试把跟住房相关的花费部分依据不同的组成依次从总消费支出中扣除，这样分别采用几个消费指标用于本文的测算和分析。因此，最终对于消费分别采用了 4 项定义来进行：全部支出 C1，为全部的家庭支出+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和经济支出+家庭医疗支出；C2 为 C1 扣除住房首付和月供；C3 为 C2 再扣除住房保养维修；C4 为 C3 再扣除房租支出，即不含与住房相关的任何支出的消费。

2. 养老保险的度量。本文一个重要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与户籍相关的家庭所享受的养老保险水平对于消费模式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如何测度养老保障程度成为本文另一个主要的指标。这里主要考察 3 类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效果，以家户成员享受的保险的实际给付水平作为预期收益，计算家庭生活保障的平均水平。本文不计入已经开始获得养老保险的养老金部分，因为这个部分不是预期收入，并且已经作为当期收入计入了家户的收入水平中。具体的做法为：对于各项养老保险 $pension_i$ （ $i=1, 2, 3$ ，即 3 类养老保险分别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农民工养老保险），计算该家庭拥有某种养老保险但尚未领取养老金人员的比例乘以该养老保险在当地 j （即所处城市）的给付水平 $expected_income_j$ ，再对该家庭在 3 项养老保险的这一数值加总并取标准化值（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

$$pen_{index} = STD\left(\sum_{i=1}^3 pr_{pension_i} * expected_{income_j}\right) \quad (3)$$

图 2 给出了城市本地家庭、城市到城市外来流动家庭以及农村到城市的外来流动家庭的养老保险水平（标准化数值）。可以看到，城市本地家庭拥有相对较高的养老保险水平；而对于来自农村的外来家庭而言，这一水平非常低；由其他城市转移来的家庭的养老水平居于两者中间。

^①比如购买住房的首付款和月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投资而非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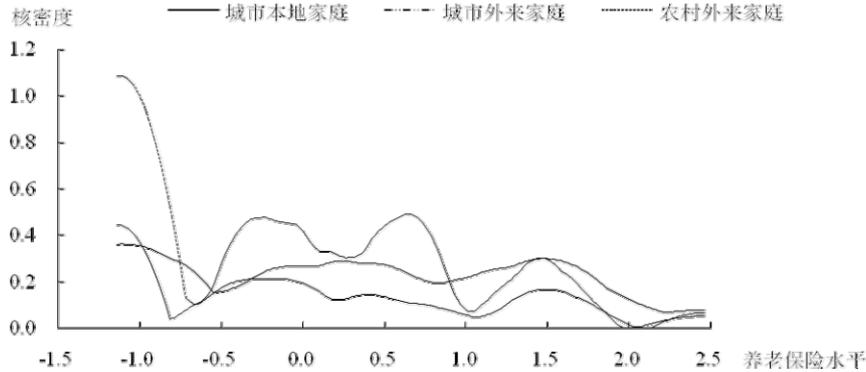


图2 各群体家庭的养老保险水平（标准化值）

3. 模型设定。本文接下来的部分仅聚焦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那部分外来流动家庭，用以分析其与城市本地家庭和农村流动家庭的消费模式的差异^①。为了观察农村流动家庭和城市本地居民家庭在消费模式上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以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模型为基础，并参照已有文献对于消费函数的分析（Attanasio and Brugiavini, 2003; Carroll, 1994; Attanasio and Weber, 1995）使用以下的经验模型，对两个群体的消费弹性及基本消费的情况进行研究^②：

$$\ln c_i = \alpha_1 \ln y_i + \alpha_2 (\ln y_i)^2 + \beta_1 M_i + \beta_2 M_i * \ln y_i + \gamma^j A_i^j + \delta * P_i + CT + \varepsilon_i \quad (4)$$

(4) 式中， $\ln c_i$ 是家庭 i 的月人均消费的对数； $\ln y_i$ 为其月人均收入的对数，同时加入收入对数的平方项，以观察随收入提高消费弹性的变化； M_i 是反映户籍状态的虚拟变量，“1”代表该住户为农村迁入本市的家庭； A_i^j 反映了家庭的年龄构成， j 表示年龄组别^③； P_i 是家庭的养老保险指数（其度量方法已在前文描述）； CT 是城市虚拟变量以控制地域因素对消费的影响； ε_i 为随机扰动项。本文关心的参数包括 β_1 ，它反映了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外来家庭在基础消费上与本地家庭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以及 β_2 ，它反映了外来家庭与本地家庭在边际消费倾向上的差异。

^①本文曾尝试把城市到城市的转移劳动力同时纳入到样本中作为外来家庭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与外来家庭这一变量相关的系列变量变得均不显著，这就说明在消费模式上，与城市本地家庭真正有异的为农村流动家庭，然而样本混合模糊了相关的差异。与此同时，混合样本的模型结果中与养老保障相关变量的系数并无重大变化。因此，为了明确城市本地家庭和农村流动家庭的消费差异，本文正文中不保留城市流动家庭部分样本。相关结果备索。

^②事实上，在不同的文献中在消费决定方程中加入各种不同的控制变量（如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然而并没有这些因素对消费产生影响机制的充分的理论支撑，因此本文在正文的主模型并未涵盖更多的控制变量。与此同时，作者也尝试将这些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但并未对本文的主要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相关结果可向作者索要。

^③年龄组别本文参照Attanasio and Brugiavini(2003)在文章中的设定，分别设置为19岁以下、20~35岁、36~45岁、46~55岁、56~60岁、61~65岁以及66岁以上几个年龄组。

(三)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图3给出了城市本地家庭和农村流动家庭的年龄、收入、总消费以及扣除大额消费的消费4个主要变量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本地居民的年龄分布在整个生命周期上更为均匀，农村流动居民的年龄更集中于20~35岁左右的区间；本地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农村流动家庭，但差异不大；两个群体在总消费上差别不大，扣除大额消费后农村流动家庭的消费低于本地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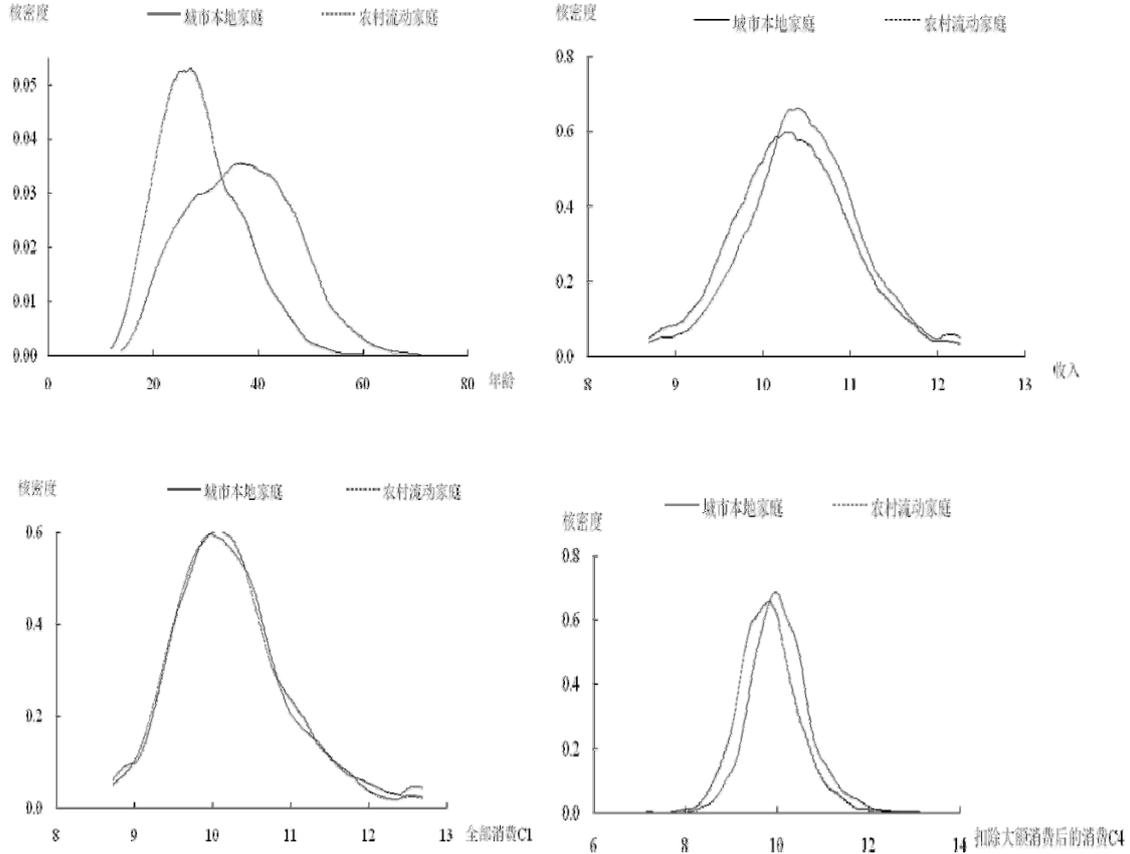


图3 城市本地家庭和农村流动家庭主要变量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ULS4 数据库计算得到。

注明：消费和收入均为对数值。

从表1给出的更详细的城市本地家庭和农村流动家庭的相关指标的均值描述可以看出，城市本地家庭的平均年龄为不到40岁，外来流动家庭的平均年龄为不到30岁，外来人口更为年轻；而外来人口中女性占比则相对较低，较之于本地人口的接近50%，外来人口的女性比例约为45%；从家庭规模上看，本地家庭人口规模为3人以上，外来人口则不到3人。从本文所关注的收入和消费变量上可以看出，如果以包含工作收入、家庭转移和财产收入以及养老金收入的总收入来看，外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为4.36万元，略低于本地家庭的4.73万元。然而，如果观察工作收入部分可以看到，外来家庭的人均工作收入为接近4.3万元，几乎贡献了外来家庭的全部收入，人均工作收入是高于

本地家庭的（这部分源于外来人口多为进城务工的劳动年龄人口，而本地家庭会包含更多的老人和小孩等被抚养人口）；在总收入中的家庭转移和财产收入部分，本地家庭在 2016 年的人均水平为 1557 元，外来家庭仅不到 400 元；对于养老金收入，本地家庭获得的养老收入在 2016 年约为 6192 元，而外来家庭基本尚未获得养老金的收入。

表 1 城市本地家庭与外来流动家庭的特征、收入和消费状况

	城市本地家庭		外来流动家庭	
	2010	2016	2010	2016
平均年龄（岁）	39.52	38.01	27.98	28.98
女性比重（%）	50.41	49.30	45.34	44.23
家庭规模（人）	3.17	3.09	2.69	2.84
家庭人均年总收入（元）	19349.85	47282.8	22919.11	43595.24
其中：				
工作收入	17625.65	38970.87	22329.27	42980.17
财产和转移收入	1026.98	1557.59	383.96	385.23
养老金收入	309.67	6192.60	-	10
家庭人均年消费（元）				
C1	15171.12	41430.96	15861.04	38210.35
C2	13975.01	32315.02	14931.91	31823.07
C3	-	31565.7	-	31586.68
C4	13386.59	31528.62	11330.47	24605.2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ULS3 和 CULS4 数据库计算。

注：①在 CULS3 中，没有外来家庭获取养老金收入的相关指标，且没有住房维修保养支出的指标，因此与这两个变量相关的 C3 以及养老金收入缺失。②本表的统计量按抽样比加权。

三、户籍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初步经验证据

（一）户籍对消费的影响机理

由前述分析可以看出，消费模式的差异之所以与户籍制度相关，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如果农民工和城市本地人口处于即期收入分布曲线的不同区域，那么，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存在，这两个群体可能存在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不过，只要收入决定与户籍制度无关，并不能说明边际消费倾向的这种差异是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其次，即便即期收入相同，永久收入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消费模式的不同，因此，一旦决定永久收入的因素与户籍制度相关联，例如社会保护制度，那么户籍制度将成为影响消费模式的决定因素；第三，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改变了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已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是消费模式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所谓的“退休消费之谜”实际上反映了年龄结构对消费模式的影响（Banks et al., 1998; Bernheim, et al., 2001; Hust, 2008）。而利用 CULS 第三轮数据的研究，也表明这一模式在中国有重要的影响（Du and Wang,

2011)。利用最新的城市住户调查资料, 本文将首先观察农村流入城市的外来人口与城市本地人口之间是否存在消费模式的差异, 也就是说, 这两类人群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边际消费倾向上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然后, 进一步分析这些差异是否与户籍制度相关联。

(二) 两个群体的消费模式差异

为了初步刻画城市本地家庭和外来流动家庭在消费模式上的表现, 本文首先拟合两个群体的消费函数。消费函数是指即对于特定的收入水平, 消费是什么样的模式。在消费函数中, 消费 C_i 包括不与收入相关的基础消费部分 C_0 和收入 y_i 中用于消费的部分, 其中收入项 y_i 的系数 α_1 为边际消费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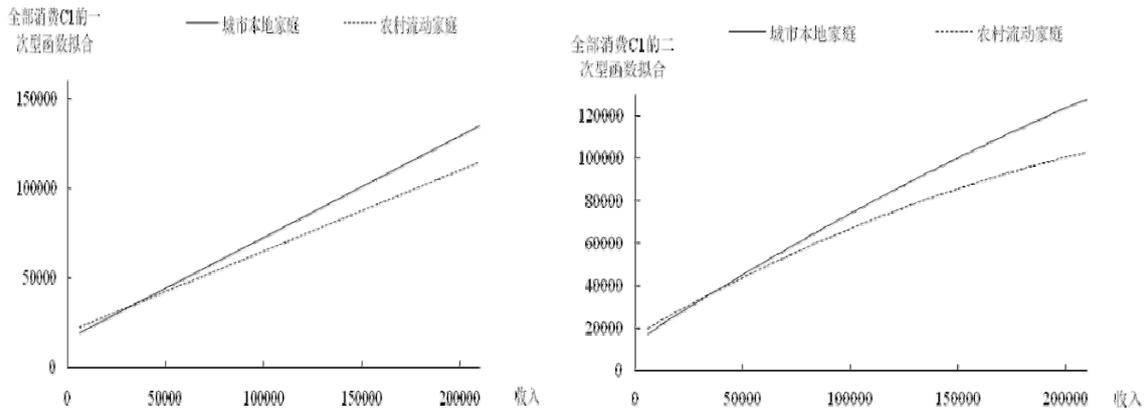
本文依据这样的消费函数分别拟合了一次型的消费函数 (只包括收入项):

$$C_i = C_0 + \alpha_1 y_i + \varepsilon_i \quad (5)$$

二次型的消费函数 (包括收入项和收入平方项):

$$C_i = C_0 + \alpha_1 y_i + \alpha_2 (y_i)^2 + \varepsilon_i \quad (6)$$

在包含了二次项的消费函数中收入的二次项的系数则代表了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提高的变化, 一般来说此项系数 α_2 为负, 即随着收入的提高, 边际消费倾向会慢慢下降。图 4 分别给出了全部消费 ($C1$) 和扣除所有与住房相关花费的消费 ($C4$) 对收入水平拟合的一次型的和二次型的消费函数。可以看出, 对于全部消费来说, 外来家庭 (虚线) 拥有更高的基础消费, 但对于不包含与住房相关的花费的 $C4$ 来说, 外来流动家庭的基础消费是低于城市本地家庭的, 这应该源于大多数外来流动家庭没有在当地拥有自己的住房, 因而需要支付房租等支出, 而更多的城市本地家庭拥有住房因而不需要相关支出。从消费倾向上看, 无论是对于哪一个消费定义, 外来家庭均拥有更低的边际消费倾向。从拟合的二次型消费函数上可以看出, 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提高是逐渐下降的, 这对于外来流动家庭更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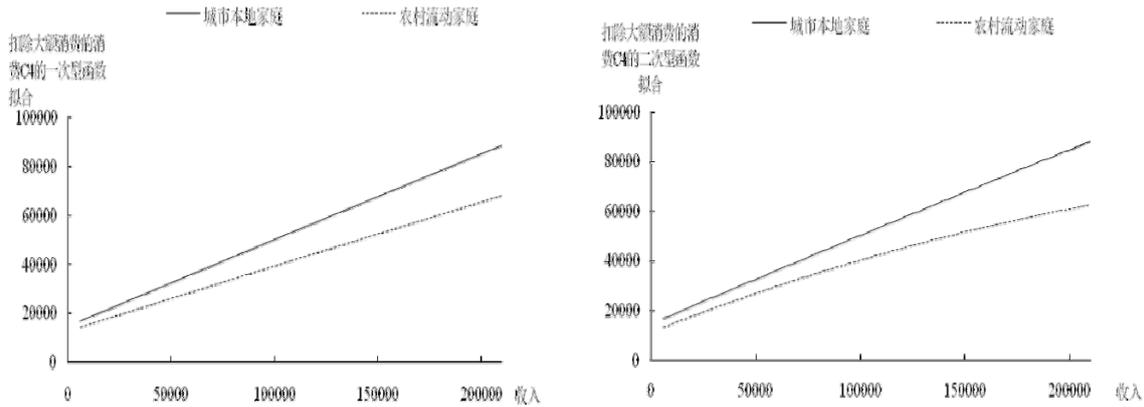


图4 城市本地家庭和外来流动家庭的消费函数拟合（一次型和二次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ULS4 数据库计算得到。

四、消费模式是否和户籍相关联？

以前面的（4）式为基础，通过不同的设定来观察消费模式变化和户籍制度的关系。其中，如果关注消费差异本身，那么可以不加入户籍与收入的交互项 $M_i * \ln y_i$ ，通过观察 β_1 得到所代表的两个群体消费的绝对差异；如果想把消费模式差异中的基础消费部分和消费弹性部分分开来分析，则需要同时加入户籍变量 M_i 和户籍与收入的交互项变量 $M_i * \ln y_i$ ，同时观察 β_1 和 β_2 。如前所述，户籍制度对消费模式的影响可能主要通过两个路径：其一，与户籍相关的制度安排，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模式可能会产生影响；其二，由于劳动力流动成为人口流动的主导模式，导致了流入地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并对消费模式产生影响。由此可以推断，如果这两种路径的确是户籍制度影响消费模式的主要因素，在控制了户籍导致的社会保障差异和年龄结构后，户籍变量在消费决定方程中将出现显著的变化。同时，户籍制度可能对消费的类型也会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也将使用不同的方式定义消费类别，以观察上述模式的变化情况。

首先，观察户籍制度对家庭全部消费 $C1$ 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表 2 的第一列是最基本的估计式。在这一估计式中只放入了（1）式中的前四个变量：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対数、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的平方项、户籍虚拟变量、户籍与收入的交叉项以及城市虚拟变量，而没有控制家庭的人口结构和养老保障水平等其他特征。回归结果显示，消费水平随收入增长呈非线性的变化关系^①。其中，本文最关心系数 β_1 和 β_2 的情况。结果显示，以 β_1 反映的外来人口的初始消费水平，高于城市本地人口，但以 β_2 反映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市本地人口。表 2 的第二列控制了家庭的年龄结构，发现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的消费模式的差异进一步加大，外来家庭户籍变量正系数增大，户籍与收

^①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分别用消费和收入的対数值进行回归，因而测算的是二者的弹性关系。图 4 使用消费和收入的绝对水平拟合的二者的线性和二次型关系，测度的是消费倾向的水平。

入交互项具有负的系数，其绝对值也增大。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年龄结构以后，外来家庭拥有更高的基础消费以及更低的消费弹性。表 2 的第 3、4、5 列进一步加入了养老保险指数、养老保险指数与外来户口以及养老保险指数与收入的交互项。从这几个变量的系数上可以看出，养老保险的系数为正，养老保险和收入的交叉项系数为负，养老保险与农村外来户口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也就是说养老保险有助于消费的提升，并且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提升效果更为明显。这对本文前面的预期给出了初步的结果，即外来人口与城市本地人口的消费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年龄结构和户籍相关的制度性因素相关。然而，从这里并没有观察到在控制了年龄结构和社会保险变量以后 β_1 和 β_2 的数值绝对值开始减少并趋于 0，本地和外来家庭的消费模式并没有趋同的趋势。

表 2 户籍对消费模式的影响：全部消费

	M1	M2	M3	M4	M5
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対数	-2.411*** (-7.69)	-2.057*** (-6.66)	-2.051*** (-6.65)	-2.284*** (-6.86)	-2.276*** (-6.84)
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的平方	0.140*** (9.44)	0.122*** (8.34)	0.121*** (8.30)	0.133*** (8.38)	0.132*** (8.33)
户籍	0.678* (1.89)	0.840** (2.37)	0.918*** (2.59)	1.082*** (2.96)	0.868** (2.20)
户籍×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对数	-0.0595* (-1.74)	-0.0878*** (-2.60)	-0.0927*** (-2.74)	-0.108*** (-3.10)	-0.0873** (-2.33)
家庭的养老保险指数			0.0347*** (2.90)	0.344** (2.07)	0.330** (1.98)
家庭的养老保险指数×收入				-0.0289* (-1.86)	-0.0263* (-1.69)
家庭的养老保险指数×户籍					-0.0337 (-1.45)
年龄结构		YES	YES	YES	YES
城市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9.98*** (12.10)	18.27*** (11.25)	18.31*** (11.28)	19.49*** (11.19)	19.48*** (11.19)
观测值	4047	4047	4047	4047	4047
调整后的R方	0.271	0.302	0.303	0.304	0.30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ULS4 数据库计算。

注：①括号内为统计值；②*、**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③表中所有回归结果按照抽样比加权。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发现是否稳健，将所有与住房相关的大额消费依次从家庭总消费中排除，即依次剔除住房首付、月供、装修、租房等支出，分别以前面定义的 C2、C3 和 C4 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同样的模型设定估计上述几个模型。这样不仅使消费数据更接近于平滑的日常消费，也使得

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消费项目的可比性更强。表3列出的回归结果所使用的设定与表2完全一致，但消费的定义为扣除掉所有与住房相关的花费的消费 C_4 ^①。可以看出，表3中同样显示了养老保险指数依然为正、养老保险和收入的交叉项系数依然为负，且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但养老保险指数与户籍交互项的系数仍然不显著。也就是说，在剔除住房相关花费后，养老保险对消费仍然有提升作用，尤其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但对于农村外来家庭没有额外的提升效果。

有意思的是，当剔除了大额的住房消费后，把户籍相关的消费差异分离成户籍以及户籍和收入交互项两个变量的模型中， β_1 和 β_2 都不太显著。也就是说，对于一般性消费来说，本地和外来家庭的消费差异并没有明显地区分为消费的基础消费差异部分和消费倾向差异部分。

表3 户籍对消费模式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M1	M2	M3	M4	M5
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対数	-1.712*** (-6.15)	-1.459*** (-5.27)	-1.454*** (-5.25)	-1.798*** (-6.03)	-1.792*** (-6.01)
家庭人均年收入対数的平方	0.103*** (7.79)	0.0902*** (6.87)	0.0895*** (6.83)	0.106*** (7.49)	0.106*** (7.45)
户籍	0.133 (0.42)	0.217 (0.68)	0.288 (0.91)	0.531 (1.62)	0.380 (1.07)
户籍×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対数	-0.0310 (-1.02)	-0.0477 (-1.57)	-0.0521* (-1.72)	-0.0746** (-2.39)	-0.0601* (-1.79)
家庭的养老保险指数			0.0316*** (2.95)	0.489*** (3.28)	0.479*** (3.21)
家庭的养老保险指数×收入				-0.0428*** (-3.07)	-0.0410*** (-2.92)
家庭的养老保险指数×户籍					-0.0237 (-1.14)
年龄结构		YES	YES	YES	YES
城市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6.62*** (11.33)	15.41*** (10.57)	15.44*** (10.61)	17.18*** (11.01)	17.18*** (11.00)
观测值	4047	4047	4047	4047	4047
调整后的R方	0.268	0.286	0.287	0.289	0.28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ULS4 数据库计算。

注：①括号内数据为t统计值；②*、**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③表中所有回归结果按照抽样比加权。

鉴于这样的结果，本文再次尝试以上述5个模型为蓝本，但并不再分离户籍相关的消费差异中

^①对于C2和C3的估计结果，限于篇幅此处略，备索。

的绝对值部分和消费倾向部分，也就是在模型中只保留户籍虚拟变量 M_i ，去除掉户籍和收入的交互项变量 $M_i * \ln y_i$ ，估算模型（7）：

$$\ln c_i = \alpha_1 \ln y_i + \alpha_2 (\ln y_i)^2 + \beta_1 M_i + \gamma^j A_i^j + \delta * P_i + CT + \varepsilon_i \quad (7)$$

图 5 给出了分别以 C1 和 C4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 5 个模型估算结果中的 β_1 系数，用以观测在依次加入年龄结构和社会保险相关变量后，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消费差异的绝对值的变化。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对于包含住房相关支出的全部消费而言，外来家庭的固有消费更高（模型 1 的 β_1 显著为正）；在控制了年龄结构以后，外来家庭的固有消费更低（模型 2），也就是说如果外来家庭拥有和本地家庭同样的年龄结构，那么外来家庭的总体消费水平会更低；在最值得关注的加入一系列社会保险相关变量的模型 3~5 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全部消费 C1 还是去除住房相关花费的消费 C4 而言，系数为负值的 β_1 无一例外地体现出提高（绝对值下降）。也就是说，如果享有与本地家庭同等的养老保险的覆盖，外来家庭较低的消费水平会有所提高，养老保险的预期收入有助于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两个群体在消费模式上的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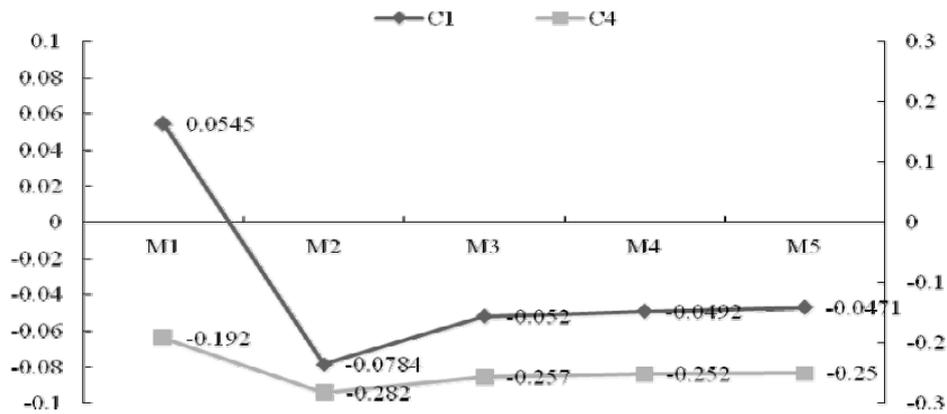


图 5 控制不同变量后两个群体消费的绝对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ULS4 数据库计算得到。

注：图中数值分别为对于 C1 和 C4 估算 M1~M5 模型中的户籍变量的系数，与前面模型不同的是，模型中不再加入户籍与收入的交互项，反映了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两个群体的消费水平的绝对差异。

五、动态变化: CULS3~CULS4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是从 2001 年开启的一系列调查，已经分别在 2001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6 年进行了 4 轮调查。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消费模式在不同时段上的表现和变化，可以采用前面几轮的调查数据进行同样的测算和刻画，用以与 2016 年的状况加以比对。对于本文所需要的核心变量，包括收入、消费特别是养老保险等相关基础指标，鉴于较早期的调查数据

中许多指标难以与最近的指标相匹配，这里仅采用最近一轮在 2010 年的 CULS3 的数据进行相应的分析，并尽量把相关指标设置调整为与 CULS4 一致的口径。本文旨在从这样的动态分析中了解：在这个时期内，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在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的覆盖的差异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两个群体基本的消费水平态势是否发生了变化？此外，本文更加关注与户籍相关的社会保险对于消费模式影响的作用机制又怎样改变？因此，这个部分笔者通过利用 CULS3 估算 2010 年的消费函数，测算养老保险指数，并估算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的消费决定方程来观察这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养老保险情况变化

图 6 给出了本地和外来家庭的养老保险指数的水平和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在 2010 年和 2016 年情况。养老保险指数的水平指一个家庭在养老保险方面的预期收入，本文把 2010 年城市本地家庭的这一水平设为标准 1^①；养老保险覆盖率指是否享有 3 种养老保险中的任一种的家庭的比率。可以看到在 2010~2016 年间，本地家庭的养老保险无论是在水平上还是覆盖率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并不大；然而，在此期间，外来家庭的养老保险水平从 0.23 提高到 0.6，覆盖率更是从 0.17 提高到 0.51。也就是说，虽然在养老保险方面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的差异仍然十分巨大，但是，这一差异也在逐渐的改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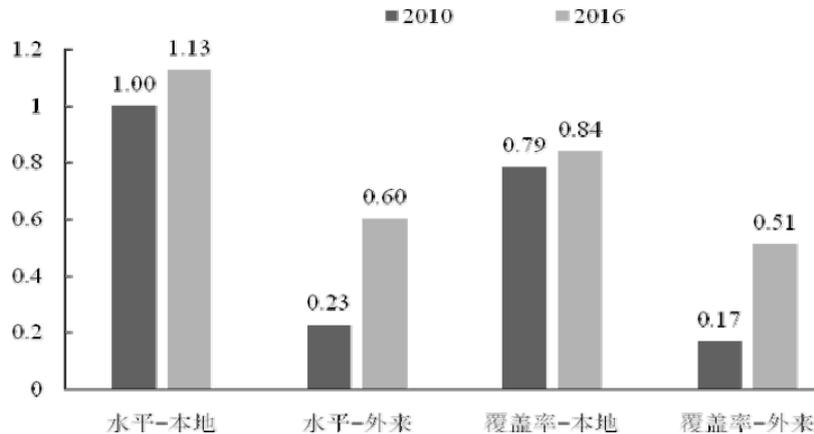


图 6 2010~2016 年养老保险状况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ULS3 和 CULS4 数据库计算得到。

（二）消费模式变化

对于城市本地家庭和农村流动家庭两个群体的消费模式差异，本文主要考察几个消费决定模型中的 β_1 和 β_2 两项系数，通过观察两个系数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就可以大概得知两类家庭在消费模

^①为了便于作图，本文把养老保险的水平中的城市本地家庭在 2010 年的取值设为标准值 1，其他各项为相对值。这里 2010 年本地家庭的养老保险水平为 11758 元，那么外来流动家庭在 2016 年的养老保险水平的相对值为图中所示的 0.6，养老保险的绝对水平为 11758*0.6=7065 元。

式差异上的变化。在前面的消费模型中，本文一共估算了5组模型，并且分别用以区分绝对消费差异（户籍虚拟变量系数 β_1 ）和消费弹性差异（户籍和收入交互项系数 β_2 ）和只观察绝对消费差异两种方式进行了估算。如此，利用2010年CULS3数据和2016年CULS4数据，分别以全部消费C1和扣除所有与住房相关花费的消费C4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全部10组模型估算的结果中的 β_1 和 β_2 系数，结果见表4。表4的上半部分是加入户籍虚拟变量 M_i 和户籍与收入交互项 $M_i * \ln y_i$ 的各模型，用以观察 β_1 和 β_2 在各模型中在不同年份的表现。表4的下半部分为去除户籍与收入交互项 $M_i * \ln y_i$ 的模型，以观察 β_1 在各模型中在不同年份的表现。可以看出，对于全部消费C1，如果区分绝对消费和消费弹性两个部分，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的消费模式差异在2010年和2016年间变化很大，具体体现在：2010年，外来家庭具有更低的基础消费，但消费弹性更高；而在2016年，可能源于住房等相关消费的大幅提高，外来家庭的基础消费更高，而消费弹性更低。这样如果观察C4的情况，以及不区分基础消费和消费弹性只观察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消费绝对差异的话，那么可以看到，在2010~2016年间，两个群体的差异有所缩小，这体现在对于C4模型，无论是哪一组模型中，体现两个群体消费差异的 β_1 和 β_2 两项系数在2016年都变得更为不显著或者绝对值变小。也就是说，如果扣除掉住房这样的大额消费，总体而言，2010年到2016年间外来家庭的消费模式已出现了与本地家庭趋同的趋势。

表4 消费模式差异的变化

		M1	M2	M3	M4	M5	
		含户籍变量与户籍和收入交互项的模型					
C1	β_1	2010	-0.795***	-0.840***	-0.850***	-0.518*	-0.346
		2016	0.678*	0.840**	0.918***	1.082***	0.868**
	β_2	2010	0.0728***	0.0743***	0.0734***	0.0396	0.0236
		2016	-0.0595*	-0.0878***	-0.0927***	-0.108***	-0.0873**
C4	β_1	2010	-0.911***	-1.032***	-1.034***	-0.762***	-0.525*
		2016	0.133	0.217	0.288	0.531	0.38
	β_2	2010	0.0601**	0.0702***	0.0700***	0.0424	0.0204
		2016	-0.031	-0.0477	-0.0521*	-0.0746**	-0.0601*
		不含户籍与收入交互项的模型					
C1	β_1	2010	-0.0820***	-0.111***	-0.130***	-0.130***	-0.114***
		2016	0.0545**	-0.0784***	-0.0520*	-0.0492*	-0.0471*
C4	β_1	2010	-0.323***	-0.344***	-0.347***	-0.347***	-0.325***
		2016	-0.192***	-0.282***	-0.257***	-0.252***	-0.25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CULS3和CULS4数据库测算。

注：①M1~M5的完整模型设置参见表2，表中列出的是户籍变量的系数 β_1 和户籍与收入交互项的系数 β_2 。②*、**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③表中的所有回归结果按照抽样比加权。

（三）养老保险提升消费效果的变化

本文更加关注的是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保险对于家户消费模式的影响效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前面的模型 3~5 在消费决定模型中依次加入了养老保险指数变量，养老保险指数与收入的交互项，以及养老保险指数与外来户籍的交互项，在模型 5 (M5) 中则涵盖所有这一系列变量。这里把 M5 中这几项的系数，对于 C1 和 C4 分别在 2010 年和 2016 年的取值列出 (表 5)。可以看出，在 2010~2016 年间，养老保险对于消费的提升效果是显著提高的，养老保险指数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变大；养老保险对收入较低家庭的消费 C4 的提升效果是增强的，养老保险指数与收入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绝对值也有所提高。2010 年，养老保险对于外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效果更强，然而这个对于外来家庭额外的提升效果在 2016 年已不再存在。

表 5 养老保险对于消费提升效果的变化

	C1			C4		
	养老保险指数	养老保险指数 *收入	养老保险指数 *户籍	养老保险指数	养老保险指数 *收入	养老保险指数 *户籍
2010	0.317***	-0.0347***	0.0597***	0.280***	-0.0299***	0.0819***
2016	0.330**	-0.0263*	-0.0337	0.479***	-0.0410***	-0.023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ULS3 和 CULS4 数据库测算。

注：①表中数值分别对应于模型 5 中该变量的系数；②*、**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③表中的所有回归结果按照抽样比加权。

六、结论：消费模式转变与扩大消费

户籍制度对中国劳动力流动模式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其消费模式。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改变了人口在城乡间的分布，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蔡昉, 2018)。与此同时，这样的人口流动对消费模式的变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有研究关注农民工消费的问题 (王美艳, 2017)。而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个人的社会保障不可携带，在同一地区的户籍差异也带来了家庭消费差异。本文聚焦人口流动模式对城市常住人口的消费特征的影响，利用丰富的住户调查数据，对外来流动家庭和城市本地家庭的消费模式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估算和分析。

分析和测算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住房相关的大额支出，外来家庭的消费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当地家庭，造成差异的部分原因是两个群体不同的年龄结构。除此之外，不拥有城市当地户籍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养老保障的获得上显著低于本地人口。而恰恰这一关系到未来预期收入的养老保障对于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通过对人口流动模式和社保体制的矫正，可以优化消费结构、扩大消费的潜力 (包括基础消费和消费倾向)。这也可以从本文对 2010~2016 年情况的动态分析结果上反映出来。分析结果表明，在此期间，虽然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保的获得、消费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始终存在，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享受情况已有较大改善，消费模式也略有趋同，且社会保险对于消费的拉动效果也日趋显著。因此，可以期待更深化的户籍改

革, 消除与户籍相关的保障制度方面的障碍, 进一步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消费模式差异, 通过提升消费为经济增长贡献源泉。

参考文献

- 1.白重恩、李宏彬、吴斌珍, 2012: 《医疗保险与消费: 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 《经济研究》第2期。
- 2.蔡昉, 2011: 《农民工市民化与新消费者的成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3期。
- 3.蔡昉, 2018: 《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耗尽了么? 》, 《中国农村经济》第9期。
- 4.陈斌开、陆铭、钟宁桦, 2010: 《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 《经济研究》第S1期。
5. 都阳, 《应对外部冲击需要稳健的劳动力市场》, 《经济日报》2018年8月16日版。
6. 都阳、朴之水, 2003: 《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 《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7.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 2008: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 1989—2004》, 《经济研究》第7期。
- 8.凌晨、张安全, 2012: 《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研究: 理论与实证》, 《管理世界》第11期。
- 9.吕越、娄承蓉、杜映昕、屠新泉, 2019: 《基于中美双方征税清单的贸易摩擦影响效应分析》, 《财经研究》第2期。
- 10.谭语嫣、谭之博、黄益平、胡永泰, 2017: 《僵尸企业的投资挤出效应: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经济研究》第5期。
- 11.王金营、付秀彬, 2006: 《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人口研究》第1期。
- 12.王美艳, 2017: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 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比较》, 《劳动经济研究》第6期。
- 13.徐舒、赵绍阳, 2013: 《养老金“双轨制”对城镇居民生命周期消费差距的影响》, 《经济研究》第1期。
- 14.杨汝岱、朱诗娥, 2007: 《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 ——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 《经济研究》第12期。
- 15.臧文斌、刘国恩、徐菲、熊先军, 2012: 《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经济研究》第7期。
- 16.臧旭恒、朱春燕, 2000: 《预防性储蓄理论——储蓄(消费)函数理论的新进展》, 《经济学动态》第8期。
- 17.周绍杰、张俊森、李宏彬, 2009: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 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季刊)》第4期。
- 18.朱信凯、骆晨. 2011: 《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 一个文献综述》, 《经济研究》第1期。
- 19.何兴强、史卫, 2014: 《健康风险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 《经济研究》第5期。
20. Attanasio, Orazio P. and Weber Guglielm, 1995, "Is Consumption Growth Consistent with Intertemporal Optim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6):1121-1157.
21. Attanasio, O. P., and A. Brugiavini, 2003, "Social Security and Households' Sav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3): 1075-1119.

22. Attanasio, O. P., and S. Rohwedder, 2003, "Pension Wealth and Household Saving: Evidence from Pension Reform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5): 1499-1521.
23. Banks, J., Richard Blundell, and Sarah Tanner, 1998, "Is There a Retirement-Savings Puzzle?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4): 769-88.
24. Bernheim, B., J. Skinner and S. Weinberg, 1997, "What Accounts for the Variation in Retirement Wealth Among U.S. Households? ", NBER Working Paper 6227.
25. Carroll, Christopher, D., 1994, "How Does Future Income Affect Current Consumption?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1): 111-147
26. Du, Y. and Meiyang Wang, 2011, "Population Ageing,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Futur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 Jane Golley and Ligang Song (eds.) *Rising China: Glob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NU Press.
27. Hurst, Erik, 2008, "The Retirement of a Consumption Puzzle", NBER Working Paper 13789.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 云 音)

Differences in Consumption Patterns between Local and Migrant Household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An Analysis of Chinese Urban Labor Survey Data

Qu Yue Du Yang Jia Peng

Abstract: The consumption level is not only a kind of measurement for people's livelihood, but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uture. Understanding consumer behavior and its chang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Based on the 2016 and 2010 China Urban Labor Survey data (CULS4 and CULS3),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urban local households and migrant households in cities, analyzes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differences in consumption patter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estimates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related pension insuranc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decision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pension insurance for migrant households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urban households, and the expected benefit from pension insurance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households' current consumption level, especially for the lower income groups. Therefore, further eliminat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linked to the Hukou system will help achieve the convergence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migrant and urban households, promote the overall consumption level, and expand the potential of consumption.

Key Words: Consumption Pattern; Social Security; Migrant Household